

從敵情到學術： 英文學界之北韓史研究

• 毛 升

一 前言

朝鮮半島(為避免國名的混淆,本文用「北韓」指代中國大陸地區習慣所稱的北朝鮮,用「南韓」指代南朝鮮,用「朝鮮」或「朝鮮半島」指代南北韓作為一個整體)進入美國公眾的視野要等到1950年代初的朝鮮戰爭之後。在那場戰爭中,多達33,643位美國士兵死於戰場,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即美軍對自己的對手一無所知。戰前,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帶着種族主義的優越感,宣稱金日成手下那些士兵見到白人就會潰不成軍、逃之夭夭。但上了戰場之後,他卻驚訝地發現,北韓軍人英勇善戰,所向披靡。讓美軍無法理解的是,既然金日成只是蘇聯的傀儡,北韓軍人只是替蘇聯人賣命,蘇聯人怎能如此成功地動員他們?更奇怪的是,北韓士兵的敢死精神明顯受到了民族主義的感召,作為異族的蘇聯人又是如何激發他們這種情緒呢?為甚麼南韓軍人卻根本不願打仗?他們丟在戰場上的武器都足夠裝備十支軍隊^①。即使戰後,美國人對於朝鮮半島的了解仍然有限。一位韓裔美籍教授曾跟筆者說起他四十年前的親身經歷:他十歲時隨父母從南韓移民美國,每次美國人見到他這張亞洲面孔都會問:「你是中國人?」他搖頭。「你是日本人?」他亦搖頭。對方就會大惑不解:「那你是哪國人?」

朝鮮研究(Korean Studies)進入美國大學要到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而且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科目,只是作為東亞研究的一小部分^②。教授在講授東亞史的時候,為了敘述完整,一般會簡略地提到朝鮮半島在歷史上為一個國家,如今卻被三八線一分為二:一邊是進步的大韓民國(南韓),另一邊是被蘇聯操控的、實行社會主義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

*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李丹慧教授的支持,特此感謝。

如果說美國的南韓研究一度發展緩慢，主要是因為美國人缺乏興趣，不願將學術資源花了一個在他們看來並不重要的國家的研究上的話，北韓研究的情況則相對複雜。就如同朝鮮戰爭深刻地影響了北韓之後的內政、外交和民眾對西方世界的觀感，美國對待北韓的態度也被那場聲稱已「被遺忘」的戰爭所定義——即北韓是美國的敵人^③。基於這樣的定位，長期以來美國主導的英文世界對北韓只有「敵情研究」，目的是窺探這個神秘的「邪惡國家」，以便收集情報和制訂對策，確保美國及盟國的國家安全。學者普遍不認為對北韓有學術研究的必要，但是隨着1980年代末南韓推動民主化、1990年代初北韓第一次核危機，以及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解體後相關檔案陸續開放，美國人對北韓的興趣劇增，出版物層出不窮。一開始主要是新聞記者、外交人員、「脫北者」、難民以及到此一遊的遊客所寫，嚴謹的、具原創性的學術專著不多。即使如此，美國在這個領域的成果還是有了一定的積累，具備了自己的特色，值得中文學界借鑒、批評。

本文試圖梳理英文學界關於北韓研究的歷史學著作的內容、背景、問題意識、特色及其範式轉移，並參考了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阿姆斯特朗(Charles K. Armstrong)對該領域狀況的分析^④。但不同之處在於，阿姆斯特朗在文章提到的著作包括政治、外交、經濟、社會、藝術等多個領域，而本文主要評論在北韓研究方面最富成果的政治史、外交史的狀況，並更新了2011年該文章發表後出版的最新著作。另外，阿姆斯特朗的文章的目標讀者為英文學界，本文針對的讀者則是中文學界的同行，並根據中文讀者的興趣進行取捨、評述。需要聲明的是，研究朝鮮戰爭的著作並不在本文評論範圍內，該領域在英文學界已經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課題，著作數量龐大，獨具特色，需要專文討論。

二 史料

北韓研究最大的困難就是史料難以獲得。北韓幾乎與世隔絕，除了宣傳材料外，研究者很難獲得其他資料。目前學者主要利用的材料大概有以下幾類：

一、北韓公開出版的報刊、宣傳材料、領袖著作、講話等。這些材料出版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宣傳，研究者必須非常謹慎，才能於其中獲得有用信息。

二、1950年冬天美軍佔領平壤後繳獲的檔案，名為《美軍在朝鮮繳獲之紀錄》(*Records Seized by U.S. Military Forces in Korea*，以下簡稱《繳獲紀錄》)，現保存於馬里蘭州的大學公園市美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 Maryland)，檔案號為Record Group 242。該檔案多達1,608,000頁，材料基本為朝鮮文，也有一些日文和俄文書籍。這些材料包括金日成早期講話的手冊、報紙、雜誌、北韓各種組織的會議紀錄、朝鮮勞動黨的文件、政府文件、書信、日記、照片、個人檔案、法庭紀錄等。這些材料於1977年解密，其中一部分已經整理出版，對了解1945年日本戰敗後至1950年

朝鮮戰爭發生前的北韓有很高的史料價值^⑤。儘管利用率不高，還是有學者根據這些材料寫出了金日成的傳記，以及探討了1950年之前共產革命對北韓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日常生活的深刻影響^⑥。

三、跟北韓交涉過的國家的檔案。如西方國家的外交檔案及情報、日本秘密警察搜集的朝鮮勞動黨的情報及審訊口供。但最值得利用的還是社會主義陣營裏的盟國的檔案，目前最方便利用的就是俄國（前蘇聯）、德國（前民主德國〔東德〕）、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東歐國家的檔案，中國的部分檔案也已經解密，可供學術研究之用。為了方便學者更好地利用多國檔案，位於華盛頓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已經將大量的蘇聯、東歐檔案翻譯成英文，有的已經出版。該中心涉及北韓的研究項目有兩個，一個是「冷戰國際史計劃」（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另一個是「北韓國際文獻計劃」（The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Documentation Project, NKIDP）。雖然這些檔案呈現的是盟國的視角，卻極大地填補了北韓自身檔案不開放所造成的空白。利用這些檔案出版的著作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外交史領域，極具原創性^⑦。

四、「脫北者」、難民、北韓人的回憶錄、自傳、訪談等。住在南韓的北韓難民已經多達二萬人，還有好幾萬住在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這些數量龐大的難民群體成為外界了解這個封閉國家的重要渠道，他們的見證、訪談已經成為北韓研究的重要材料。另外，外國新聞記者的觀察以及個別曾在北韓生活、學習、工作過的外國人的回憶，也是學界值得利用的材料^⑧。

三 主要研究成果及研究範式

英文學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研究始於政治學領域，其對北韓的研究最初也是從政治學領域開始，試圖了解朝鮮勞動黨黨權、領導人、北韓社會狀況以及與蘇聯、中國等盟國的關係。筆者見到的最早發表的有分量的研究專著為1972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共產主義在朝鮮》（*Communism in Korea*），兩位作者施樂伯（Robert A. Scalapino）和李鍾奭都是政治學學者。該著作利用的材料多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日本檔案，比如秘密警察、司法部、內政部、駐朝鮮總督、外務與軍事部門等的官方文件。這些絕密文件中有每日的情報、逐字逐句的警察和檢查官的審訊記錄、法庭審判記錄、被日本繳獲的大量朝鮮勞動黨的文件與材料、警察局的報告、政治犯的交代材料等。同時，作者還對多位親歷者做了訪談，有的是共產運動的參與者，有的則為知情人。這部書的上冊是關於朝鮮共產運動的歷史，如運動的起源、日據時代的起伏、在東北與朝鮮邊境地區的游擊活動、在美國控制下的南韓和蘇聯佔據下的北韓的發展狀況、朝鮮戰爭時期的情況、勞動黨內的權力鬥爭，以及金日成如何在派系林立的黨內成為最高領袖。下冊則主要考察北韓的社會狀

況，黨、領袖與幹部之間的關係，社會控制機制，意識形態，軍事政治制度，農業、工業等多個方面^⑨。這兩冊厚達1,500頁的書可謂開山之作，用了當時所能獲得的一切材料，細緻地考察了朝鮮共產主義運動從萌芽到1970年代為止的發展狀況，至今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在北韓的國家制度中，領袖所起的作用舉足輕重，因此西方學界很想了解金日成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他是如何到達權力頂峰？他的主要思想是甚麼？北韓出版的金日成傳記不僅極度美化金日成，還會根據形勢的需要不斷加以修改，而西方的媒體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總是對其妖魔化，都非信史。美國政治學學者徐大肅在《北韓領袖金日成》(*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一書中利用《繳獲紀錄》，試圖書寫一部有所本的金日成傳記。該書對金日成人生中的各個面向都有所呈現：參加抗日戰爭的經歷、如何獲得權力、在黨內面臨怎樣的挑戰、如何試圖統一朝鮮半島、如何在蘇聯和中國之間尋找平衡、如何擴張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影響力、他的政治思想尤其是「主體」(Juche)思想是如何出台的？他如何成功地培養了自己的兒子金正日成為接班人^⑩？這本出版於1980年代末的傳記持之有故，成為北韓研究領域的必讀書之一。

另一本值得一讀的著作是《游擊隊派王朝：北韓的政治與領導》(*The Guerilla Dynasty: Politics and Leadership in North Korea*)，作者布佐(Adrian Buzo)成為學者之前，曾在1975年擔任過澳大利亞駐北韓外交官。雖然此書在材料的利用上乏善可陳，主要利用其他學者的研究或金日成的著作，但難能可貴的地方是結合了作者個人對北韓的體察，通過討論幾個在作者看來北韓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來呈現該政權的演變軌迹，並預測將來的可能走向。作者將這種演變放在一個長時段中審視，並將事件放入一個複雜的背景當中加以討論，如列寧黨的特色、斯大林組織與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則、朝鮮自身的政治傳統、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以及朝鮮傳統的武裝組織等。在這本可讀性很強的著作中，作者特別強調了蘇聯因素對北韓的影響^⑪。

在北韓研究領域中，學者討論最多的問題是北韓的政治制度如何形成？同樣是在蘇聯的佔領下建立的斯大林式政權，何以北韓和東歐如此不同？北韓與東歐最初實行的都是一黨主導、多黨合作的「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制度，何以東歐基本保持了這種賦予基層相對多一點自由的制度^⑫，而北韓卻變成了世襲的一黨制領袖專政國家？上面提到的三部著作都強調了蘇聯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即北韓對斯大林式蘇聯制度的模仿與繼承。但不同的是，斯大林雖然也鼓吹個人崇拜，但被崇拜的不只是他一個領袖，還有列寧甚至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為甚麼金日成是北韓唯一被崇拜的領袖？如果一切都只是斯大林主義的複製，為甚麼北韓比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更專制？柏林牆倒下了，蘇聯也已經解體多年，何以北韓的專制政權卻還能持續？

1980年代初美國學界的蘇聯史研究，尤其是關於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蘇聯(即斯大林主義的研究)出現了範式轉移，從極權主義學派(Totalitarian school)轉向了修正主義學派(Revisionist school)。在西方，人們通常以「大清洗」、「古

拉格」等現象來定義斯大林主義，那麼這種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呢？極權主義學派試圖重新解釋何以一個被指稱為既「沒有政治合法性」，也「沒有群眾基礎」的政黨可以統治這個國家如此之久。極權主義學派是冷戰時代的產物，對此的解釋自然離不開那個時代「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對立，即認為蘇聯是一個極權政權，通過政變得以上台，不僅將自己信奉的意識形態強行灌輸給社會，而且以此來改造社會。在蘇聯共產黨的統治下，人們失去了各種自由，社會喪失了抵制公權力入侵的能力，失去了自我保護的可能。同時，斯大林主義並非蘇聯革命的一個斷裂或岔路，而是其必然的結果。

修正主義學派則挑戰了該範式，認為蘇聯社會並不是如極權主義學派所認為的那麼被動、無助地任由一個無所不在的政府宰制。修正主義學派光譜複雜，其中一些學者認為，工人、農民積極參加「十月革命」，他們是支持布爾什維克黨的，因此「十月革命」並非非法政變，而是群眾革命，蘇聯政府獲得了極大的群眾基礎。另外一些學者繼而指出，斯大林主義並非「十月革命」的自然產物，斯大林錯誤地偏離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是非常態的。那麼，如何重新解釋斯大林主義的形成？有的學者認為，斯大林控制了黨內人事任免的大權，也就綁架了黨機器，讓其為個人的利益服務。有的學者則指出，農民佔多數的、現代化程度不高的蘇聯社會，為類似傳統父權的斯大林主義提供了豐富的土壤。有學者還相信，蘇聯社會的一些群體支持甚至鼓吹斯大林的政策，如迅速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甚至是「大清洗」^⑬。

北韓政權的研究自然也在這個潮流當中，只是語境不同。極權主義學派認為，北韓只是蘇聯的傀儡政權，其制度也只是斯大林主義的翻版，蘇聯共產政權強加在北韓老百姓身上的統治形式是違背當地人意志的。修正主義學派則認為，蘇聯對北韓的影響並不如一般認為的那麼大，北韓共產革命並非蘇聯主導，而是本國民眾的一場社會革命，蘇聯的影響只是居次要地位。該派學者認為，因為北韓政權在1940年代末獲得了極大的民眾支持，才使社會主義革命在朝鮮半島上得以成功。而北韓的制度最主要的影響也不是來自蘇聯，而是來自日據時代的制度遺產，以及比中國儒家文化更具壓制性的朝鮮儒家傳統。朝鮮戰爭研究的大家卡明斯 (Bruce Cumings) 就提出，北韓政權其實深受日據時代的軍事傳統和日本的天皇崇拜制度影響，而不是單純學習蘇聯^⑭。2018年，多倫多大學東亞系教授施密德 (Andre Schmid) 發表文章，批評北韓研究中的極權主義學派不僅忽略了金氏統治下的北韓社會仍有一定的自主性，在史料的解讀上也往往將北韓政府聲稱其所要達到的社會控制程度當成了事實。作者指出，一個政府宣稱要實現的目標與實際上所能達到的結果往往有明顯的距離，即金氏政權對社會的控制力並沒有學者想像的那麼大，借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說法，國家在任何地方都不如自己草擬的文件中所宣稱般強大^⑮。

卡明斯的弟子、前述的阿姆斯特朗利用《繳獲紀錄》，採取修正主義視角，完成了研究北韓社會主義制度形成初期的政治、文化、經濟和社會變化的大作《北韓的革命，1945-1950》(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1945-1950)。

該書雖然承認社會主義制度在北韓的形成受到了佔領者蘇聯的深刻影響，但該制度無論在北韓上層還是地方上，都馬上開始了本土化的過程，而且從一開始就明顯地表現出了這種本土因素。惜乎西方學者總是相信北韓無非蘇聯的傀儡，一切都操縱於蘇聯之手，一葉障目，認識不到本土因素的作用。比如，在意識形態領域，北韓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唯意志論，即強調意志的重要性而忽略日常的物質生活，在這方面比共產中國和越南更極端。原因何在？在阿姆斯特朗看來，這主要是受到了朝鮮儒家傳統的影響，儒家文化在自詡為「小中華」的朝鮮要比在中國和越南更加非世俗化，更傾向原教旨主義。北韓政權將強調唯物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倒轉了過來，認為並不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倒是人的意志才決定一切，物質是次要的。光憑這種唯意志論，北韓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就很不相同。與其說它像東德或波蘭，不如說更像同樣深受儒家文化浸潤的越南。其實，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才是典型的蘇聯衛星國，由蘇聯軍隊建立，並在各個方面長期依賴蘇聯，一旦蘇聯放棄支持，其社會主義制度很快難以為繼。北韓的社會主義制度雖然也是依靠蘇聯佔領軍建立，但即便蘇聯已經在世界上消失，北韓還能繼續存在，這種獨立性恐怕只有在本土因素中才能找到解釋。北韓從一開始就表現出很明顯的民族主義傾向，只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剛建立的時候，被北韓領袖小心地掩藏在對蘇聯和斯大林的讚美之中。

阿姆斯特朗認為，在當時的東亞社會，無論北韓、越南還是中國，民族主義與親蘇的所謂國際主義並不互相排斥；對東亞的民族主義者來說，走社會主義道路是為了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富強，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相輔相成。對於落後國家來說，單靠自身的力量無法實現反帝反殖的任務，需要尋求外援，而當時的蘇聯是唯一願意提供援助的外國，親蘇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即使這些民族主義者在各自的國家掌權，他們也並不認為接受蘇聯的援助或鼓吹斯大林崇拜妨礙了本民族的獨立，相反，只有依靠這種策略，才能早日實現本民族的獨立。但就如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越南的民族化一樣，北韓馬上也開始了本土化的過程，顛倒了列寧所倡導的民族主義作為形式、社會主義作為內容的民族政策，倒是實現了蘇聯移植的社會主義作為形式、強烈的民族主義作為內容的本土化的民族斯大林主義 (Nationalist Stalinism) ⑩。

蘭科夫 (Andrei Lankov) 顯然不同意卡明斯等人對極權主義學派的修正。在其頗受推崇的著作《從斯大林到金日成：北韓政權的建立，1945-1960》(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 一書中，他批評修正主義學派矯枉過正，過度弱化了蘇聯在北韓政權的建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在蘭科夫看來，斯大林主義在北韓落地生根主要還是源於蘇聯在其中操控，當時來自本土的力量並不明顯。蘭科夫是俄羅斯人，在蘇聯時期曾留學北韓，現任教於南韓國民大學，主要用英文發表學術成果。他的著作利用1990年代初俄國解密的蘇聯檔案，這是學界第一次得以從蘇聯的記錄中一窺北韓的歷史。該書在章節安排上顯然受制於其當時所能獲得的俄國檔案，有的問題討論詳細，有的則很簡略，並沒能系統地討論斯大林式制度在北韓建

立時的各個主要面向。該書主要研究蘇聯在佔領北韓之後如何逐步建立起一個蘇聯模式的政府、金日成究竟為何方人氏、北韓上層內部的權力鬥爭、蘇籍朝鮮人作為一個派別在北韓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1956年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的前因後果。書中特別讓人動容的是蘇籍朝鮮人在北韓的不幸遭遇：他們被蘇聯政府派到北韓，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些人滿懷革命理想和出身蘇聯的優越感，真誠地希望把北韓改造為一個如同蘇聯一樣的現代國家，並為此付出很多心血，最後卻因為被視為外來的勢力，遭到金日成的「游擊隊派」清洗。作者感慨，正是這些人的努力幫助北韓迅速建成了一個斯大林式政權，最後他們卻成了該制度的犧牲品^⑦。歷史研究依賴史料，而學者的觀點也很容易被他能讀到的史料所影響。蘭科夫的材料主要為俄國檔案，也沒能利用美國國家檔案館所存的朝鮮材料，蘇聯在北韓制度建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自然顯得尤其突出。

該書出版後三年，蘭科夫又將關於「八月事件」一章加以擴充，寫成了名為《北韓的危機：去斯大林化的失敗，1956》（*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的專著，更詳細地考察該事件的來龍去脈及其影響。作者認為，該事件對北韓的內政、外交影響巨大，不可忽略。在外交上，「八月事件」之後，金日成清除了黨內親蘇的勢力，尤其是蘇籍朝鮮人幹部，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不再作為蘇聯的傀儡；同時，在國家政策上也逐步清除蘇聯和中國的影響，利用中蘇之間的矛盾，開始等距離外交，在兩個大國之間尋找對北韓最有利的平衡點。在內政上，該事件的影響尤其明顯，它決定了此後幾十年北韓政權奉行「平壤特色的斯大林主義」，即1955年金日成提出的所謂「主體社會主義」（Juche Socialism）。在1956年之前，北韓的制度非常類似於東歐的「人民民主」，但「八月事件」之後，逐漸變成了斯大林主義的變種：嚴格控制、高度軍事化、無所不在的領袖崇拜，與正統的馬列主義甚至斯大林主義漸行漸遠，並確立了更加極權的制度。「主體」思想對北韓社會的影響也是弊遠大於利，它固然有助於北韓擺脫蘇聯的控制，擁有更大的獨立性，但這種獨立性並沒有給貧困的北韓人民帶來任何物質上的實惠。一個主要依賴外援才得以發展的國家，一旦失去足夠的外來支持，經濟狀況自然一落千丈。金日成和跟隨他的平壤精英終於可以獨立決定北韓的道路，但老百姓卻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⑧。

同樣是試圖回答北韓獨特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建立，任教於南韓高麗大學的匈牙利裔學者紹隆陶伊（Balázs Szalontai）利用匈牙利的外交檔案，出版了著作《赫魯曉夫時期的金日成：蘇聯與北韓之關係及北韓專制的根源，1953-1964》（*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 Soviet-DPRK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n Despotism, 1953-1964*）。這本書試圖跳出上述兩個學派的二元對立，給出一個不同的解釋。在紹隆陶伊看來，北韓的制度之所以與東歐不同，當然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但既不應該過度強調來自蘇聯、中國、日本的外來因素，也不必誇大朝鮮歷史上的專制與隔離傳統，最主要的還是金日成及效忠於他的「游擊隊派」身上所具有的強烈的懼外民族主義情緒（intense

and xenophobic nationalism)。這種情緒既來自他們個人的經歷，也來自歷史記憶和抗戰結束之後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

作者認為，金日成的不安全感的形成不能只從朝鮮過去的歷史傳統中尋找原因，而是有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大概有四個轉折點：第一個轉折是日據時代，尤其是1931年之後日本軍方成功地扼殺了朝鮮境內的反日活動，瓦解了朝鮮人在東北的游擊運動；為了生產戰爭物資，日本在朝鮮開始推動大規模的工業化，並進行文化同化，這些舉措都強化了包括金日成在內的朝鮮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第二個轉折是1945年蘇聯佔領北韓，這導致了金日成對「老大哥」又愛又懼。因為蘇聯的支持，他才得以順利成為北韓領袖，但蘇聯對北韓內政的強勢干預，以及大量親蘇幹部在勞動黨中佔據重要位置，二者對金氏權力的制衡又使得金日成覺得領導權被冒犯，清除親蘇派自然是必須邁出的一步。第三個轉折是南韓共產運動的失敗，以及朝鮮戰爭並沒有達到統一朝鮮半島的目的，更導致了南北韓持久的對抗，令金日成產生挫敗感。這些失敗不僅使得金日成失去對社會主義盟友的信任，甚至對自己統治下的北韓人民的能力也失去信心。第四個轉折則是蘇聯的去斯大林化運動對北韓帶來的影響。因為該事件，北韓徹底擺脫了蘇聯的控制，蘇聯也失去了干涉「八月事件」的意願，金日成雖遭遇其他派系的圍攻，但仍躲過了類似東歐所發生的那些反政府運動。之後，金日成及其擁護者可以完全根據自己的意願，安排北韓的制度，但外交上的不安全感已深刻地影響了內政，中蘇干涉和美國支持南韓發動攻擊的可能性，都使得金日成的懼外情緒始終無法舒緩^⑨。

在修正主義學派之後，1990年代末美國開始轉向所謂的後修正主義學派(Post-revisionist school)，其中一個重要分支就是現代性學派(Modernity school)。該學派在理論上深受法國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響，在方法上將斯大林主義放入世界史的背景加以比較。換句話說，對斯大林主義的解釋既不在政治上層，也不在社會底層，而是訴諸全球史的分析框架。冷戰時代，學者普遍認為蘇聯的制度是與西方民主國家對立的，沒有任何共通性。因此，學界都在強調蘇聯制度的獨特性，並加以譴責。冷戰結束後，兩種制度的截然對立迅速鬆動，學界開始不僅看到兩種制度的不同，也認識到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政權的作為和民主國家之間類似的方面。他們認為，蘇聯國家的產生既不是領袖的個性或者意識形態本身的問題，也並非因為該制度最適應蘇聯的文化社會傳統、經濟狀況，從而獲得了民眾對其的支持、配合，而是起源於啟蒙時代的理念和強調對社會實行理性干預的歐洲規訓文化(European disciplinary culture)，即現代性。國家對社會更深入全面的干預興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總體戰時代的到來使得歐洲各國的政府通過領袖崇拜、社會監控制度、宣傳機器、侵犯個人隱私、國家暴力和福利制度，以保證國民不僅忠誠於政府，也能為國家戰鬥。這些都是以大眾政治為特徵的現代國家所使用的手段，並非只有蘇聯如此，民主國家亦然。只是民主國家有憲政制度，戰爭時代國家權力無限擴張，但戰事一旦結束，受到憲法制約的國家機器就會恢復原狀，成為有限政府。而蘇聯因為缺乏憲法的約束，無法將擴張的國家

權力關回籠子裏，政府也習慣了大政府的高效率，並形成路徑依賴，這才是以斯大林主義為特徵的蘇聯政府在戰後仍然得以維持的原因²⁰。紹隆陶伊顯然並沒有跟着這個潮流走，而是自成格局，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作為匈牙利學者，雖用英文書寫，但並不熟悉西方的學術脈絡；同時，北韓對斯大林主義的偏離也使得他對於後修正主義範式是否對北韓有解釋能力抱有懷疑。這是北韓研究與蘇聯史研究的一個不同之處。

阿姆斯特朗2013年出版的著作《弱者的暴政：北韓與世界，1950-1992》(*Tyranny of the Weak: North Korea and the World, 1950-1992*)，也沒有跟隨後修正主義潮流，還是在傳統的政治史、外交史研究領域中，但換成從邊緣視角看國際關係，用新眼光看老題目。他一改過去將北韓當成國際舞台上一個可有可無的小卒，而是以其為中心去考察從朝鮮戰爭到蘇聯解體這四十年時間裏，這個小國如何與蘇聯、中國、東歐、第三世界國家打交道，去透視一個弱國如何利用強國之間的競爭來獲得生存空間與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如何在中蘇矛盾之間保持等距離外交，雖然是在「走鋼絲」，卻上演了一齣齣以弱勝強的好戲²¹。作者利用了大量最新解密的多國檔案，通過考察北韓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不只勾勒了北韓外交史的脈絡，更是雄辯地告訴我們，冷戰史不只是美蘇爭霸史，社會主義陣營內部也不是中蘇就能決定一切，小國的作用也很重要，不可忽略，北韓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該書無疑加深了我們對於冷戰史以及國際關係中同盟關係的認識，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今天北韓的一舉一動為何總是能夠牽動中美關係起伏。

西方學界研究共產革命，往往只關注革命「破舊」的一面，忽略其「立新」的創造性面相。共產革命不只試圖砸爛一個舊世界，更是要創造一個新世界，而新的生產方式的建立也形成了新的社會關係。同樣是利用《繳獲紀錄》，卡明斯的另一位學生金秀智眼光朝下，考察共產革命如何影響了北韓人的日常生活。她在《北韓革命下的日常生活，1945-1950》(*Everyday Life in 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1945-1950*)中指出，北韓社會在抗戰之後、朝鮮戰爭之前並不是如今天人們所認知的那樣貧窮、落後，反倒顯得比南韓更有前途：工業更發達、生活更富裕；更重要的是，它給時人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於日據時代或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方式。激進的土改運動改變了基於財產佔有多寡決定的人際關係，北韓歷史上舉行的第一次選舉帶給普通人強烈的國家主人翁歸屬感，掃盲運動給邊緣農村目不識丁的人創造了從來不敢奢望的教育機會。老百姓逐漸被編制進入政府控制下的各種組織，如無處不在的群眾集會、多如牛毛的學習小組，公私之間的界限很快開始模糊，集體生活也成為一種常態。日記、自傳不再只是記錄作者個人的生活，更記錄了如何將自己的生活融入波瀾壯闊的革命事業之中、個人如何成為集體中的一份子、如何努力地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社會主義新人。將壓在社會最底層的婦女解放出來，也是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女性走出家庭，融入革命的洪流，「革命母親」成為北韓婦女的新的認同。這些都是革命在北韓所創造的全新的社會關係，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西方的日常生活史研究不只是嘗試鉤沉過去人們如何吃喝玩樂，而是有一套理論關懷，歐洲的左派思想大家如布羅代爾 (Fernand Braudel)、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和德塞都 (Michel de Certeau) 對權力結構和日常生活的關係都有深入的闡釋²²。究竟人們的日常生活是一個被宏大的權力結構所宰制而無力擺脫的領域，還是一個人們可以與權力結構進行對抗的空間？在權力結構與行動者的關係方面，金秀智在書中選擇了中庸之道，即日常生活雖無法擺脫權力結構的影響，但也並非毫無能動性，還是有反抗的空間。因此，作者認為即使如北韓這樣的國家，也不能完全控制社會，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仍然在持續地對話。國家無法完全無視社會的反作用，始終需要與社會不斷談判，甚至妥協，試圖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平衡點。本書在英文學界的價值就是指出，北韓的歷史不只是「關於一個人或一個政黨的歷史」，而遠比這些豐富。北韓也不是一個被現代化所遺忘的國家，其歷史是一部現代化的歷史，只不過北韓代表的是一種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現代性不同的一種所謂「社會主義現代性」(Socialist Modernity)²³。

英文世界在政治史、外交史、社會史之後，出現的另一個範式是新文化史。該研究的理論較為複雜，簡單地概括，這種研究方法認為「歷史事實是甚麼」固然重要，但「事實如何被表述」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基於這種信仰，學者擱置檔案，轉向報刊、電影、戲劇，去尋找象徵層面的歷史。在北韓研究領域中，流風所被，有學者開始去分析北韓的大眾文化，關心的主要問題從北韓制度如何建立，轉換成了該制度如何維持、宣傳在其中如何產生作用。

英文學界第一本關於北韓藝術史的著作為現任大英博物館亞洲部副主任白珍 (Jane Portal) 所著的《受控制的北韓藝術》(*Art under Control in North Korea*)。本書涉及的藝術種類多樣，如紀念碑、浮雕、建築、領袖像章、各種繪畫、木刻、攝影、海報、書法、瓷器。作者將北韓的藝術放在現代國家與藝術的關係中進行討論，指出國家總是在利用藝術為現實服務，這種趨勢在二十世紀得到極大加強，極權國家尤其如此。金日成雖然強調「主體」，但他鼓吹藝術為政權服務的觀念明顯複製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Socialist Realist Art) 理念，在藝術家的組織方式，作品的主题、風格上都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極其相似。例如，利用電影和戲劇作為主要宣傳手段，動員數量龐大的人口參加大型群眾表演，作品多為集體創作，表現的都是革命、英雄題材，這些都是北韓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在藝術表現上的相似之處。但作者也指出，北韓的傳統觀念也體現在其藝術之中，比如在表現女性的題材上，由於朝鮮王朝時代的儒家思想更加嚴格，北韓藝術中對女子的呈現要比毛澤東時代所謂「男女各佔半邊天」更為保守。而領袖崇拜的主题在北韓的作品中尤其突出，且主要圍繞金日成一人，這顯然與帝王傳統有關。作品主要滿足政府的管治需要，為政府服務，也為政府嚴格控制，而不是表達藝術家個人的感受和靈感，創作意圖被嚴格限制在表達對政權和領袖的忠誠和讚美。從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今天的北韓似乎還是生活在過去，不斷地回顧金日成和他的游擊隊如何將老百姓從日本殖民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拯救出來，鮮有表現當下題材的作品²⁴。

對北韓的大眾藝術進行更深入考察的有金淑英的《虛幻的烏托邦：北韓的戲劇、電影與日常表演》(*Illusive Utopia: Theater, Film, and Everyday Performance in North Korea*)一書。作者試圖回答的問題是：為甚麼北韓對於利用大眾藝術手段去塑造一個理想化的國家形象如此沉迷，儘管其實際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現實與利用藝術手段建構的形象之間有着天壤之別？這個極度貧困的國家卻捨得在宣傳上投入那麼多資源，道理何在？參與表演的人真的相信這些宣傳嗎？通過考察電影、大型群眾表演、戲劇等各種大眾藝術門類自冷戰以來在北韓的發展，作者希望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北韓的制度何以維持下來。該書認為，這些進入日常生活的大眾藝術活動，不僅僅娛樂了老百姓，而且從根本上組織並動員了群眾，這是政權得以維持的很重要的原因^⑤。受到人類學理論的影響，有些學者更認為北韓是一個「劇場國家」(theatre state)，即政府對社會的控制不只是靠暴力，更是靠定期舉行各種表演來展示權力，最典型的就數萬人參加的「阿里郎」大型表演。這種由國家主導、滲透進入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各式表演，其中所展示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處於國家中心的這種象徵權力，是北韓對社會實行控制的有效手段^⑥。這種文化史研究即今天冷戰史學界所感興趣的「文化冷戰」(Cultural Cold War)，這種研究方法繞開了北韓檔案不開放帶來的不便，同時也彌補了政治史、外交史所不曾注意的面相，突出了宣傳在北韓政治中的重要角色。

四 結論與討論

從以上的綜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儘管英文世界的北韓研究仍處於發展狀態，但已經實現了從搜集敵情到學術研究的變化，並有了一定的積累，也具備自己的特色。在範式上，它明顯受到了兩個學術潮流的影響：一是美國歷史學研究的總體變化趨勢，其研究興趣從政治史、外交史到社會史、再到文化史的變化脈絡，在北韓研究中有明顯的體現，儘管政治史、外交史仍然是主流；二是蘇聯史研究，更準確地說是關於斯大林主義的研究，從極權主義學派到修正主義學派的變化在北韓研究的烙印明顯，即在回答北韓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何建立這個問題上，從強調蘇聯的影響轉向突出北韓本土的因素。

但北韓研究的獨特之處也很明顯。第一，北韓研究主要是「從外往裏看」，利用他國的材料來重構北韓的歷史。北韓檔案何時可以開放，無人能知，但他國檔案給這個領域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已經取得的成果也足以證明這種研究方法還是一條可行的道路。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也在持續不斷地收集、翻譯和出版政治史、外交史的檔案，使得利用多國檔案變得更加便利。第二，學界對於北韓的興趣目前還是被「國家安全」所主導，即如何應對北韓的核威脅，以保證美國及其盟國的安全。這也是為甚麼政治史、外交史仍然是北韓研究領域的主流，主要關心的問題為北韓這種制度如何形成、如何維持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政治史、外交史領域，近來也

已走出視北韓為蘇聯傀儡的簡單化的冷戰視角，開始強調北韓的獨立性。最近幾年的研究甚至開始以北韓為中心來書寫其與國際社會的外交互動，突出這個「弱者」在其中所起的強大作用，豐富了我們對冷戰史的理解。其實，除了政治與外交上的北韓這一主題外，英文學界也有一些優秀著作探討北韓的社會狀況、日常生活、1990年代出現的饑荒和移民問題等^②。但限於田野調查的不便以及學界對北韓經濟、社會、文化層面興趣不足，這些領域只是剛剛起步。可以想見，今後北韓研究的多樣化趨勢一定會加強，相應地，研究目的也會從制訂更有效的外交政策，轉變為試圖更好地理解這個西方人所知甚少的國家^③。

英文學界在北韓研究上的成果儘管無法跟其在中國史、蘇聯史這些領域的建樹相提並論，但對中文學界來說還是有很大的啟發。只是在閱讀、評判這些英文著作的時候，一定要意識到這些著作的目標讀者並非中國人，而是英文世界的讀者。如果說學術研究的價值在於創新，那麼這些著作的意圖就是批評英文世界既有的學術研究狀況以及改變公眾從大眾媒體上獲得的關於北韓的刻板印象，從而促使學界與公眾能以新的、不同的眼光來看北韓。因此，中文讀者如果讀這些西方學者的著作時覺得有所隔閡，實屬正常。中文學界有自己的學術傳統、問題意識以及盲區，往往與西方學界不同。因此，一定要從自己的語境出發，提出中文學界自己的真問題，並提供自己的答案；同時，要有國際視野，但不必亦步亦趨。比如今天美國學者批評的主要是西方人自我中心，長期以來將北韓妖魔化，一葉障目，「不識北韓真面目」。學者認為，只有將北韓視為一個與美國一樣的正常國家，設身處地從對方的角度看問題，才能更好地了解它，從而更有效地化解朝鮮半島危機。而對於中文學界來說，我們需要破解的迷思恐怕正好相反。2017年初版、2018年增訂再版的《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一書，是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沈志華利用中文、俄文檔案研究中朝關係的著作。該書從中國自身的問題意識出發，將長期以來關於中朝關係「血濃於水」的簡單論述放回歷史脈絡中，呈現出其中的複雜性，從而深化了我們之前對中國與這個近鄰的關係的簡單化理解^④。該書經改寫、翻譯後已經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為英文學界的北韓研究提供了一個中國學者的視角^⑤。

註釋

①③ Bruce Cumings, *North Korea: Another Country* (New York: New Press, 2004), 8-10; 5.

② Charles K. Armstrong, "Development and Directions of Kore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Korean Studies* 1, no. 1 (2014): 36.

④ Charles K. Armstrong, "Trends in the Study of North Kore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 no. 2 (2011): 357-71.

⑤ Dae-sook Suh, "Records Seized by U.S. Military Forces in Korea, 1921-1952", *Korean Studies*, vol. 2 (1978): 177-82.

- ⑥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rles K. Armstrong, *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1945-195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Suzy Kim, *Everyday Life in 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1945-1950*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 ⑦ Andrei Lankov, *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2);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Balázs Szalontai, *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 Soviet-DPRK Relations and the Roots of North Korean Despotism, 1953-19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arles K. Armstrong, *Tyranny of the Weak: North Korea and the World, 1950-199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 ⑧ 這一方面比較重要的英文書或英譯本如下：Kang Chol-hwan and Pierre Rigoulot, *The Aquariums of Pyongyang: Ten Years in the North Korean Gulag*, trans. Yair Rein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1); Erik Cornell, *North Korea under Communism: Report of an Envoy to Parad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Guy Delisle, *Pyongyang: A Journey in North Korea*, trans. Helge Dascher (Montreal: Drawn & Quarterly, 2003); Michael Harrold, *Comrades and Strangers: Behind the Closed Doors of North Korea* (West Sussex: John Wiley & Sons, 2004); Bradley K. Martin, *Under the Loving Care of the Fatherly Leader: North Korea and the Kim Dynast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4); Mike Kim, *Escaping North Korea: Defiance and Hope in the World's Most Repressive Countr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Charles Jenkins, *The Reluctant Communist: My Desertion, Court-Martial, and Forty-Year Imprisonment in North Kore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Kim Yong with Kim Suk-young, *Long Road Home: Testimony of a North Korean Camp Survivo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Barbara Demick, *Nothing to Envy: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 (London: Granta Books, 2010)。
- ⑨ Robert A. Scalapino and Chong-sik Lee, *Communism in Kore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 ⑩ Dae-sook Suh, *Kim Il Sung: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 ⑪ Adrian Buzo, *The Guerilla Dynasty: Politics and Leadership in North Korea* (New York: I. B. Tauris & Co., Ltd., 1999).
- ⑫ Croey Ross, *Constructing Socialism at the Grass-Roo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st Germany, 1945-65*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9; R. J. Crampton, *Eastern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nd After*, 2d e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⑬ David L. Hoffmann, "Introduction: Interpretations of Stalinism", in *Stalinism: The Essential Readings*, ed. David L. Hoffman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3), 2-4; Sheila Fitzpartick, "Politics as Practice: Thoughts on a New Soviet Political History", *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and Eurasian History* 5, no. 1 (2004): 30-32.
- ⑭ Bruce Cumings, *North Korea: Another Country*; "Getting North Korea Wrong",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71, no. 4 (2015): 64-76.
- ⑮ Andre Schmid, "Historicizing North Korea: State Socialism,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Cold War Historiograph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3, no. 2 (2018): 439-40.
- ⑯ Charles K. Armstrong, *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1945-1950*.
- ⑰ Andrei Lankov, *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

- ⑱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 ⑲ Balázs Szalontai, *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
- ⑳ Stephen Kotk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David L. Hoffmann, ed., *Stalinism*; Peter Holquist, *Making War, Forging Revolution: Russia's Continuum of Crisis, 1914-192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David L. Hoffmann, *Cultivating the Masses: Modern State Practices and Soviet Socialism, 1914-193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Stephen Kotkin, *Stalin: Paradoxes of Power, 1878-1928*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4).
- ㉑ Charles K. Armstrong, *Tyranny of the Weak*. 該書在2013年出版後曾廣受好評，次年獲得美國歷史學協會頒發的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但因某些史料存在偽造的嫌疑，引發學術規範爭議，作者退回了獎項，並對原書相關地方做了改正，重新出版。雖然該事件是近年來美國北韓研究領域的一宗醜聞，但該書的寫作視角有很大的創新，仍值得列入學術史中加以討論。
- ㉒ Fernand Braudel, *The 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 1, trans. Siâ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 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3 vols., trans. John Moore (London: Verso, 1991-2005); 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F. Rendal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㉓ Suzy Kim, *Everyday Life in the North Korean Revolution, 1945-1950*.
- ㉔ Jane Portal, *Art under Control in North Korea*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5).
- ㉕ Suk-young Kim, *Illusive Utopia: Theater, Film, and Everyday Performance in North Kore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0).
- ㉖ Heonik Kwon and Byung-ho Chung, *North Korea: Beyond Charismatic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2), 46-48.
- ㉗ 這些領域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Hazel Smith, *Hungry for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Korea*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5); Andrei Lankov, *North of the DMZ: Essays on Daily Life in North Korea* (Jefferson, NC: McFarland & Company, 2007); Tessa Morris-Suzuki, *Exodus to North Korea: Shadows from Japan's Cold Wa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Ralph Hassig and Kongdan Oh, *The Hidden People of North Korea: Everyday Life in the Hermit Kingdo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9); Andrei Lankov, *The Real North Korea: Life and Politics in the Failed Stalinist Utop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㉘ Sonia Ryang, "Introduction: North Korea: Going beyond Security and Enemy Rhetoric", in *North Korea: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ed. Sonia Ryang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9), 1-6; Michael J. Seth, introduction to *North Korea: A History* (London: Palgrave, 2018), vii-viii.
- ㉙ 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增訂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毛升：〈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上、下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8期(2017年12月)，頁123-28。
- ㉚ Zhihua Shen and Yafeng Xia, *A Misunderstood Friendship: Mao Zedong, Kim Il-sung, and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1949-197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